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现进路

蒋晟¹ 贺灿飞² 李志斌³

- (1.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2.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未来生产力形态,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抓手。为此,构建了“要素—产业—生产关系”分析框架,探讨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进路。具体而言,在要素维度上,新质生产力弱化要素空间粘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性;在产业维度上,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在生产关系维度上,新质生产力催生了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生产关系,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面对新质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区域的体制机制僵化、产业“路径锁定”和公共服务不完善等现实堵点,需围绕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从区域重大战略、板块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发,通过要素市场化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城镇公共服务提升三方面,优化生产要素、产业和公共服务布局,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更好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生产力布局

DOI: 10.13885/j.issn.1000-2804.2024.02.001

中图分类号: 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24) 02-0005-10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1]。在历史、制度、外部环境、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21世纪初,我国围绕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提出并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初步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3]。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持续完善,在四大板块战略的基础上,我国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核心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定针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政策。尽管如此,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要素配置不合理、产业协同能力弱等问题,难以适应国内外深刻变化的发展形势^[4]。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

收稿日期: 2024-02-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产业关联性、经济复杂度与区域产业发展路径创造”(421711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特殊类型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路径选择与制度优化研究”(23CJL024);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创新深化’试点推进机制研究”(2024C25047)

作者简介: 蒋晟(1994-),男,浙江武义人,博士,讲师,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研究。

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5]。

近年来,学界围绕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展开讨论,包括要素逻辑^[6]、产业逻辑^[7]、空间组织逻辑^[6,8]等,但仍有一些不足:一方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对全局性因素的分析;另一方面,对影响机制的讨论不足,缺乏系统性的学理思考,导致研究的现实指导作用不足。生产力布局涉及区域间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链的协同关系,关乎区域整体社会经济效益,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口^[9]。近年来,在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并成为指导我国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想。因此,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有必要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探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策略。

新质生产力是依托关键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新的,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是未来培育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10]。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1]。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2]。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13]。因此,本文将系统论述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堵点和实现进路。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构建“要素—产业—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为后续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视角、体系构建的节点性贡献;在实践层面,对现实堵点的梳理和对实现进路的探索可以为相关领域政策制定和制度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一、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落脚于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生产力包括要素组成、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三方面特征^[14]。首先,生产力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既涵盖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样的实体要素,又包含科学技术、教育等非实体性要素^[15]。作为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科学技术的颠覆性革命将渗透到其他组成要素中,催生新的生产要素,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其次,生产力变革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构。通过技术创新和新兴生产要素的应用,新兴产业将迅速发展,而传统产业在面临竞争压力之时,也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升级,最终引发产业结构的重构^[16]。最后,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进而奠定了社会发展方向^[17]。当生产力与现有生产关系相适应时,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但当生产力与现有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推动社会变革,以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和需求。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推动生产力的快速迭代。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有三大明显的特征。在要素层面,大数据、高技能人才、创新型技术等新质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凸显^[18];在产业结构层面,知识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导性持续增强^[19];在生产关系层面,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形成将为区域的协调发展带来新机遇,包括:1)新质生产要素强化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性;2)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3)生产关系调整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新质生产要素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性

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提升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形成以要素畅通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引领的区域要素体系,使各个地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破区域非均衡发展路径惯性^[21]。一方面,要素的顺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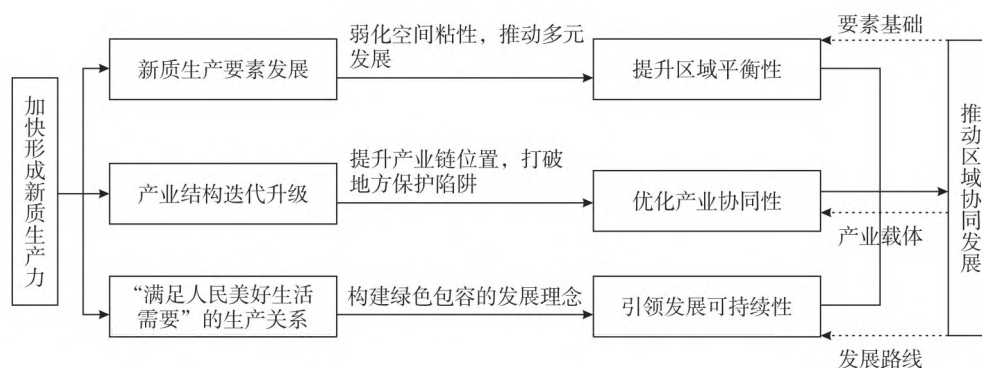


图1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

动是提升要素效率的关键因素。不同地区存在要素效率差异，需通过要素流动将要素从低效地区转移到高效地区，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损失，提高要素整体收益。另一方面，优化要素配置是共享要素收益的必要保障。要素流动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加剧要素分布的不平等。为此，要充分认识各区域的要素比较优势，优化要素空间配置，引导要素流动至各区域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在提升要素整体收益的同时，确保各区域均收获发展动能。然而，在当前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要素流动不畅和要素配置同质化现象。这背后的原因复杂，但关键原因有二：1）要素的空间粘性过强导致其难以畅通流动；2）要素的属性单一导致其组合形成的比较优势缺乏多样性。为此，需进一步完善要素畅通流动和优化配置机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传统生产力背景下的生产要素包括以普通工人为主的劳动者，传统机械设备为主的劳动资料和以自然物、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对象^[14]。然而，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呈现出与传统生产力下完全不同的属性与形态，包括以创新型人才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者、以“高、精、尖”设备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资料，和以蕴含更多技术含量的非物质要素（如数据）和原材料（如纳米材料）为代表的新质劳动对象^[21]。这将改变传统的要素空间逻辑，为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相比传统生产要素，新质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知识属性，可依托于知识的高复制性和多样性，打破要素的空间粘性桎梏和要素组合的同质化陷阱，加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首先，依托知识的高复制性，可打破要素的地理限制，畅通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渠道。知识具有高复制和易传递的特性^[23]。一旦知识被创造或掌握，它可以通过教育、文献和数据传输等方式进行复制和传播。传统生产要素由于知识密度较低，因此受时空因素的限制较大，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粘性。而新质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使得其具有更强的空间流动性，更容易进行跨地域调配。如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可以通过远程工作、移动办公等方式，实现地域的无缝连接，为不同地区的企业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支持；“高、精、尖”设备可通过远程遥控的方式进行自动化生产，提升效率；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平台，数据和技术也可以在不同地区传播。其次，依托知识的多样性，可极大丰富要素组合类型，形成区域间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化^[24]。知识本质为结构化的信息。不同的信息结构会产生差异化的知识。新质生产要素，特别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多样性，在不同领域拥有各自的专长、经验和知识技能。这种多样性使得要素组合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灵活配置。比如，不同地区的知识型人才可以根据各自的专业技能，为当地产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从而实现要素组合的差异化。并且，由于知识的高复制性，不同地区的知识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进一步推动区域间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发展。

(二)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

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提升区域发展的协同性,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产业协同关系。一方面,产业融合能有效推动区域产业的协同创新^[25]。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互补的关系,通过区域间产业的融合,可以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延伸,塑造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例如,将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结合,促进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也能增强区域产业韧性^[26]。当前,我国产业发展正面临内外部多因素的冲击。而区域间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能够促使产业链各环节相互衔接,补齐产业链断点。即使其中一个环节受到冲击,其他环节可以发挥支撑作用,减轻冲击的影响。然而,当前区域产业融合仍受制于“两头在外”和“地方保护”问题,不仅导致大量企业扎堆在产业链低端环节,难以实现产业的扩链,还无法对现有的产业资源和市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面临颠覆性的迭代升级。一方面,颠覆性升级不仅仅是对现有产品、服务或模式的改进,而是通过彻底改变传统产业组织模式来实现质的飞跃^[19]。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某个行业或领域,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它能够引发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结构的重塑,促使企业和产业实现全面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颠覆性升级通常会引入全新的技术和概念,将打破传统的边界和限制,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服务或模式,满足人们对创新和个性化的需求。

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中,产业的颠覆性升级也重构了区域间产业的协同关系,为区域间产业的深度融合扫清了障碍。首先,颠覆性升级能创造产业赶超的机会窗口,促使区域间产业链的深入融合^[27]。颠覆性升级意味着新技术的涌现。这些新技术往往具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可以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可以凭借新技术来推动产业升级,打破了海外企业的控制和垄断,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随着产业链中游和上游企业的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产业链分工逐渐清晰。一些地区可能擅长创新研发和高端制造,成为产业链的上游;而其他地区则可能专注于零部件生产或组装加工,成为产业链的中游或下游。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有助于提高所有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和效益。其次,随着区域产业链的建立,区域原本的地方保护倾向会受到冲击,从而强化区域间产业融合动能^[28]。一方面,跨区域产业链的建立扩大了市场规模。通过跨地区合作,企业可以将产品和服务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直接削弱了地方保护,促进了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区域产业链的建立促进了供应链的整合与协同发展。不同地区的企业可以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并通过协同配合实现高效的生产和物流,减少了企业对地方保护的需求。

(三) 生产关系调整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引领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绿色与包容的发展路线。一方面,绿色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29]。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面临诸如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这要求区域转变过往粗放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另一方面,包容性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30]。包容性发展致力于减少贫困、消除社会不平等、提高社会公平和稳定。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普惠性,以及促进经济机会的平等分配,区域可以缩小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与包容的发展理念相辅相成。绿色发展强调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助于提高全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也为包容性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包容性发展可以促进绿色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更多人从绿色发展中受益。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绿色与包容的发展路线,但仍存在环保转型困难、城乡收入差距大、中心城区过度拥挤等诸多问题。

发展路线转变的本质在于生产关系调整。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重要性愈发上升,最终形成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生产关系模式。传统模式下,生产关系主要依赖于资本和技术的引导,而劳动者往往被看作是执行和操作的对象。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劳动者不再仅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他们的智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24]。为了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满足他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美好需求变得至关重要。劳动者渴望在工作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感，追求有意义和有贡献的工作。只有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公平的待遇、充分的参与权和决策权，才能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因此，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生产关系模式逐渐形成。

在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生产关系模式中，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是关键，为此，区域发展必将朝着绿色化和包容化的方向演进。一方面，在区域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协调区域生态系统，从根源上抑制环境负外部性^[31]。生态系统往往跨越多个地区，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生态关联和相互作用。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如果周边区域没有进行绿色化发展，其污染就会扩散至本地，对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为此，需强化区域生态协调，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绿色优势，形成资源共享和互惠共赢的局面，提高整个区域的生产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区域包容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协调本地和外部区域所有群体的利益，缓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局势，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面发展^[32]。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本地与外部区域的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利益博弈。此时，双方均采取排他性的发展策略，不仅无法获得共赢，还有可能造成双输的局面。比如，若外来人口在本地无法获得公平的对待，其不仅无法充分发挥智力资源，还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只有确保区域之间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充分协调，使各个地区和社会群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过程，才能形成共同发展的动力和合作基础。

二、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布局的现实堵点

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有助于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也逐渐摸索出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示范意义明显。然而，区域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布局，仍受限于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僵化、产业路径锁定、公共服务功能不完善等现实堵点的制约。

（一）体制机制障碍制约新质生产要素布局

目前，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体制机制僵化现象，新质生产要素市场化建设明显滞后。这导致区域间要素流动受阻，不仅拉低了区域间要素配置的协调效率，还进一步抑制了新质生产要素的形成与转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机制不清^[33]。数据作为重要的要素资源，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面临数据要素价值不明，权属不清，监管不力等诸多问题，数据流通的整体成本较高。这导致数据要素的利用效率低下，限制了区域间数据要素的共享和协同发展。二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转化能力不足^[34]。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将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导致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融合不够紧密，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脱节，许多创新成果无法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是人才培育的市场需求导向不足^[35]。人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由于市场需求导向不足，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脱节。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过于注重理论知识，而缺乏对实际市场需求的深入了解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这导致人才供需不平衡，无法满足区域协调发展对多元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二）产业路径锁定制约产业空间协同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依托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粤港澳、长三角等先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具有科技引领性的区域产业集群，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区域在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腾笼换鸟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在西部和东北

地区,石油化工、金属冶炼等传统重工业的占比仍然较大,短时间内实现产业的迭代升级较为困难;而在中部地区,以传统装备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阵痛。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协同角度来看,落后地区若想实现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势必要与产业先发地区进行产业联动。然而,后发地区由于生产要素长期被落后产能占据,已形成明显的产业路径锁定,难以在短时间内承接来自产业先发地区的高新产业外溢^[36]。一方面,后发地区长期依赖传统产业,其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传统产能领域,如煤炭、石油化工等。这些产能所依托的劳动力、技术、能源等要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不匹配,难以短时间内完成转换。例如,在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域,更加注重的是高素质的人才、创新的科研能力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而后发地区在这方面的积累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后发地区由于长期受制于传统产业,缺乏良好的创新和技术引领环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前沿科研成果的应用。由于后发地区在科研机构、创新企业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相对薄弱,即便强行承接了先发地区的产业外溢,往往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内生势能。

(三) 公共服务不完善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布局

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需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相匹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对区域的公共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区域间缺乏公共服务功能的协调。地方政府更倾向于解决本地区的公共服务问题,而忽视了与周边区域的沟通与协调。久而久之,造成了当前我国区域公共服务功能建设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一方面,以小城市、县城为代表的欠发达区域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社会保障提升等公共服务工程^[37];另一方面,以超大、特大城市为代表的发达区域尽管在公共服务功能上大量投入,但受周边欠发达区域公共服务不完善的影响,仍无法充分发挥其服务水平,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38]。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区域公共服务功能不平等不充分的制约将愈发显现。具体而言,在欠发达区域,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科研和职业发展机会,优秀的人才倾向于流向发达区域,导致区域人才流失。与此同时,欠发达区域由于缺乏科研机构、创新孵化器和技术交流平台等公共服务设施,限制了创新要素的流动和跨区域合作,导致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困难,阻碍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在发达区域,由于堆积了大量外来人口,导致劳动力的过分拥挤,形成人才内卷。长此以往,大量人力资源被低效使用,造成浪费。而随着人口的不断聚集,环境压力愈发凸显,引发水污染、空气污染、耕地侵占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发达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大量创新成果亟待大规模投产。若无法充分调用欠发达区域的生产和市场能力,随着创新成果的堆积,发达地区的创新转化效率可能会显著下降,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

三、演化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实践进路

生产力的形成存在客观规律。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兴起,从技术关联视角解释区域生产力演化升级规律。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精明专业化”策略更是成为当前指导生产力布局的前沿思想。具体而言,演化经济地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二:1) 技术关联是推动生产力演化的关键因素,新的生产力(如要素、产业)通常与区域现有生产力存在技术关联,为此,需要充分把握区域生产力的技术比较优势,基于新旧生产力间的技术关联性,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2) 针对生产力基础薄弱的后发区域,需要与周边区域形成生产力之间的技术关联,借助周边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势能,推动本地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针对当前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形成所面对的体制机制障碍、产业路径锁定以及公共服务功能不完善等现实堵点,应围绕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体系,在充分突出本地比较优势的同时,积极强化区域间生产力的技术关联,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优化布局,具体策略有三:1) 依托区域重大战略,优化新质生产要素布局;2) 聚焦板块协调发展,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3) 以新

型城镇化为抓手，优化城镇公共服务功能布局。

（一）依托区域重大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新质生产要素布局

要素体制机制改革，是加快新质生产要素形成的关键。十八大以来，我国部署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五大重大战略发展区域。从政策内容来看，优化新质生产要素布局是其中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从现实基础来看，上述五大区域作为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核心支点，是推动新质生产要素形成，探索要素体制机制改革的先发引领区域^[39]。

首先，对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而言，需重点探索建设人才、技术、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渠道。京津冀地区由于北京的首都地位和高校、科研院所的集聚，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40]。为了实现要素协同发展，需要打通原始创新到应用创新再到规模化生产的要素流动渠道。可以通过建立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技术转移机构和产业园区等，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还需要推动政府间的协同合作，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和合作，优化要素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以及雄厚的制造业基础^[41]。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加强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通过建立创新型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和转移中心等，加强跨地区的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协同网络，促进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和澳门两大对外门户，以及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42]。未来需进一步打通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壁垒，通过建立国际化的创新合作平台、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进入，畅通国际创新要素的流通渠道，推动全球创新成果的引进与转化。

其次，对于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地区而言，需重点探索生态资源与新质生产要素之间的高效转化。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丰富，一方面可依托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数据中心，利用水电资源和水力冷却系统，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从水土污染治理角度切入，大力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开展水质监测和污染治理技术研发，提高水资源的质量，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黄河流域能源资源丰富，一方面可利用黄河流域地区的风能和日照条件，建设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基地，实现能源的清洁、可再生和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可积极推动能源相关数据要素的发展，建立能源供需预测和调度管理系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能源需求预测和优化调度，提高能源的供应可靠性和经济性。

（二）聚焦板块协调发展，构建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率先获得改革开放红利，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先行区，而其他板块则由于地理、制度、环境等多种原因，产业发展滞后，甚至陷入了产业的“路径锁定”困境。围绕板块协调发展，构建相互协同且各具特色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可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推动现有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转变，是打破产业“路径锁定”，加快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的重要路径^[43]。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需强化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加快培育世界级的先进产业集群。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明显，正加速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在未来的发展中，需对标全球产业发展趋势，聚焦“卡脖子”问题和关键共性技术开展集中攻坚，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需充分发挥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淘汰落后产能，承接东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转移。目前，中部地区在能源、材料、装备制造及部分高技术产业环节中具有一定优势，但较尖端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在未来发展中，中部地区需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承接东部地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能源、材料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推动传统重工业升级的同时，需结合自身能源资源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孕育发展新动能。目前，西部地区以重型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产业等重工业为主。在未来的发展

中,西部地区需积极推动传统重工业的技术升级,淘汰其中高污染、高能耗且技术落后的产能。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也需结合自身能源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产业,打破传统产业的路径锁定,构建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同步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对于东北地区而言,需围绕自身在部分高精尖环节的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持续发展相关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东北地区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在未来的发展中,需基于当前产业优势,主动对接国家需求,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优化城镇公共服务布局

城镇是新质生产力主要的空间载体。为此,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城市群、都市圈、超大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功能,优化城镇公共服务布局,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首先,推进城市群公共服务一体化有助于构建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平台。为此,需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城市群为重点,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协调发展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推进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共享和生态环境保护,打造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城市群公共服务网络^[44]。

其次,依托都市圈内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积极推进都市圈公共服务的同城化。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载体,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支点^[45]。为此,需积极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的同城化,提高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鼓励都市圈社保和落户积分互认、教育和医疗资源共享,推动产业园区、科研平台等大型公共设施的共享共建。对于部分有条件的都市圈,还可以成立统一的规划委员会,对公共服务的规划建设进行统一管理。

第三,推动城市更新,优化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人才往往大量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全面提升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品质不仅能优化城市面貌,还有助于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要保障^[46]。为此,需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以资源集约化、生态化、绿色化为引领,积极推动城市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疏散过度集中的医疗、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降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提升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品质。

第四,完善县城公共服务功能,推动城乡有效融合。县城是联结城市,服务乡村的基本单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态资源保障。完善县城公共服务功能,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有助于缓解城市公共资源压力,提升区域整体发展面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47]。为此,需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县城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县城和周边乡村的互联互通,提升交通便利性和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还可以增加教育和医疗设施,建设优质学校和医疗机构,吸引优秀教师和医疗人才到县城工作,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张可云.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成效与发展趋势. 人民论坛, 2024, 31 (3): 40-44.
- [2] 李国平, 何晶彦.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经验事实、理论阐释及机制创新.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40 (6): 48-57.
- [3] 孙久文, 王邹, 蒋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 25 (3): 1-10.
- [4] 贺灿飞, 李志斌.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高质量发展. 社会科学辑刊, 2023, 45 (2): 112-119.
- [5]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2023年网络首发.
- [6] 孙久文, 张可云, 安虎森, 等.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笔谈.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34 (11): 26-61.
- [7] 张少军, 刘志彪. 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 经济管理, 2013, 35 (8): 30-40.

- [8] 樊杰, 梁博, 郭锐. 新时代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 经济地理, 2018, 38 (1): 1-10.
- [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课题组, 侯永志, 张军扩, 等. 生产力布局的内涵及我国生产力布局存在的问题. 发展研究, 2014, 21 (12): 4-7.
- [10]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理论与改革, 2023, 38 (6): 25-38.
-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人民日报, 2023-09-10 (1).
- [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人民日报, 2023-12-13 (1).
-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 2024-02-02 (1).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卫兴华.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与争鸣评析. 经济纵横, 2010, 26 (1): 1-5.
- [16]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 当代经济研究, 2023, 34 (11): 51-58.
- [17]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 (6): 127-145.
- [18] 赵峰, 季雷.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 学习与探索, 2024, 46 (1): 92-101, 75.
- [19]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 改革, 2023, 39 (10): 1-13.
- [20] 张辉, 唐琦.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 学习与探索, 2024, 46 (1): 82-91.
- [21] 安虎森, 汤小银. 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探析. 南京社会科学, 2021, 32 (8): 29-37.
- [22] 周文, 许凌云. 再论新质生产力: 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 改革, 2024 (1): 1-12.
- [23] 陈则谦. 知识传播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情报杂志, 2011, 30 (3): 131-137.
- [24] 张乾友. 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转型与治理转型. 科学学研究, 2021, 39 (5): 786-793, 832.
- [25] 高洪玮.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理论内涵、现实进展与对策建议.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 (5): 73-80.
- [26] 高洪玮. 中国式现代化与产业链韧性: 历史逻辑、理论基础与对策建议. 当代经济管理, 2023, 45 (4): 11-19.
- [27] 李玉花, 简泽. 从渐进式创新到颠覆式创新: 一个技术突破的机制.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40 (9): 5-24.
- [28] 史本叶, 马晓丽.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国际经贸探索, 2023, 39 (4): 4-18.
- [29] 孙久文, 史文杰.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 区域经济评论, 2023, 38 (2): 5-11.
- [30] 洪银兴. 区域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发展. 经济学动态, 2022, 63 (6): 3-10.
- [31] 翟坤周, 侯守杰.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框架、意蕴及推进方案. 改革, 2020, 36 (11): 53-68.
- [32] 原倩. 建设包容性发展城市群——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行政管理改革, 2020, 12 (8): 71-80.
- [33] 李三希, 李嘉琦, 刘小鲁. 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与推进路径. 改革, 2023, 39 (5): 29-40.
- [34] 刘波, 李湛. 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演进、创新与政策研究. 科学管理研究, 2021, 39 (4): 8-16.
- [35] 匡瑛.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与破局之策. 人民论坛, 2022, 29 (21): 73-76.
- [36] 程显扬, 刘钊, 李天娇.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大数据分析. 宏观经济管理, 2020, 36 (3): 47-53.
- [37] 方创琳, 赵文杰. 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经济地理, 2023, 43 (1): 10-16.
- [38] 郑筱津, 尹稚, 何艳玲, 等.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城市规划, 2023, 47 (12): 55-60.
- [39] 崔琳. 以战略规划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区域治理. 宏观经济管理, 2022, 38 (8): 32-41.
- [40] 赵成伟, 张孟辉, 李文雅, 等. 京津冀协同创新机制探讨——基于主体协同与区域协同视角. 中国科技论坛, 2023, 39 (12): 116-124.
- [41] 陈雯, 刘伟, 袁丰, 等.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使命与研究焦点. 经济地理, 2023, 43 (5): 8-15.
- [42] 吴磊, 李贵才, 刘青. 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脉络与展望.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 (11): 34-41.
- [43] 贾若祥, 王继源, 窦红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改革, 2024 (2): 1-10.
- [44] 方创琳. 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 经济地理, 2021, 41 (4): 1-7.
- [45] 张京祥, 胡航军. 新发展环境下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与治理创新. 经济地理, 2023, 43 (1): 17-25.
- [46] 李兰冰, 高雪莲, 黄玖立. “十四五”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重大问题展望. 管理世界, 2020, 36 (11): 7-22.
- [47] 李国平, 孙瑀.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探究. 改革, 2022, 38 (12): 36-43.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JIANG Sheng¹ HE Can-fei² LI Zhi-bin³

(1. Zhejiang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Zhejiang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311121;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RD),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as the future form of productivity, serve as a strategic leverage for promoting CRD. To this end, the present paper, by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ctors-industry-production relations”,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QPF to facilit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in production factor dimension, this new form of productivity weakens factor’s spatial stickiness, enhancing the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industry dimension, it propels iterativ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us enhancing the industrial synergy of development. In production relation dimension, it gives rise to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imed at meeting “the people’s expectation for a better life”, boos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distribution of NQPF,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obstructions, including rigid mechanisms, industrial “path lock-in” and inadequate public services. Therefore, we need center around the strategic system of China’s current CRD to prioritize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township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or marketization and regional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as well as improvement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we can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dustries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drive the formation of NQPF to better empower CRD.

Keyword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ve forces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贾 宜)